

电影人类学在中国的开创

——杨光海导演《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 《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访谈录*

鲍江

[摘要] 以学术访谈形式回顾杨光海导演我国民族志经典电影《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的历程,旨在祛除缠绕中国民族志电影经典——“民纪片”(全称“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的西方中心主义魅影,还原影片制作过程的本来面目——兄弟民族相处之道,彰显其对电影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启发价值。

[关键词] 杨光海;詹承绪;民纪片;民族志电影;纳西族;影视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214(2016)04-0035-10

DOI:10.16814/j.cnki.1008-7214.2016.04.008

电影人类学(Ciné-anthropology),也称作民族志电影(Ethnographic Film)、人类学电影(Anthropological Film)、影像民族志(Visual Ethnography)、音像民族志(Audio-visual Ethnography)等,是美美与共的超理性知识,探索并展示跨文化背景中的人,以电影作品作为成果形式^①,开创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课题始于1957年,止于1981年,一共完成21部胶片电影作品。^②课题主旨是“抢救落后”,即在推翻“旧制度”、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变革窗口时间,用纪录电影手段存留各少数民族旧貌。^③课题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资助,以国家民族研究机构为主体,采取定制片形式委托电影制片厂制作。^④国内外学界公认这批作品为电影人类学在中国的开创经典。这门学科在欧美国家以专门学术领域兴起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尽管学界通常按学理脉络将学术史追溯到20年代美国纪录电影导演罗伯特·佛拉哈迪《北方的纳努克》、前苏联纪录电影导演吉加·维尔托夫《持摄影机的人》等经典。^⑤

[作者简介] 鲍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 本研究后期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资助。

① 鲍江:《电影人类学引论》,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第4期。

② 杨光海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剧本选编》(第一辑),说明页,1981年。郭净等编著:《中国民族志电影先行者口述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③ 齐燕铭:《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座谈会》,见杨光海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资料汇编》(第一辑),1982年,第4—6页。

④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从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调入杨光海导演组建电影摄制组,定制片阶段至此结束。这个电影摄制组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影视人类学研究室前身,是影视人类学在中国最早建立的机构。参见郭净等编著:《中国民族志电影先行者口述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7—109页。

⑤ [Belgium] Luc de Heusch: *The cinema and social science: A survey of ethnographic and sociological films*. UNESCO. 1962.

中国电影人类学开创经典有两部涉及纳西族：《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①和《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②。《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记录丽江古城建筑、木雕、造像、壁画、首饰、东巴文、东巴经、音乐、舞蹈等内容，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譬如，木府、石牌坊、寺庙塑像、古城街景等属于不可复得的20世纪60年代动态影像。影片中有一组用动画手法展示东巴文的形、音、意的镜头，对编撰东巴文音像辞典具有启发意义。

《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主题“阿注”，以一家人为线索，贯穿在自然环境、政治制度、社会形态、生产劳动、集会朝圣、生命礼仪等社会文化诸方面精当镜头叙事中呈现。诚如导演杨光海所言，作品“经过民族研究工作者、电影编导和摄制者通力合作，在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摄制完成”^③，透过影像人物的音容笑貌，观众可以感受到拍摄者与拍摄对象之间的互信。建立互信是制作民族志电影作品最为关键、也是最不容易实现的环节，这部作品做到了。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个学者群的实地调查努力是划时代的。西南地区，有学者按里外差序格局的宇宙论进路归于中华文明“中间圈”^④，自古以来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⑤另一方面，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以前，已有由中国西南通往印度的交通线。^⑥也就是说，包括永宁在内的西南地区历史上并非与世隔绝，只是少见诸文字记载。外地文人墨客鲜有人进入到永宁地区实地考察，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也止步于永宁南百多公里外的丽江。^⑦在中国学人的知识实践意义上，这个学者群所开启的实地调查存范于后学，他们收集的田野素材作为珍贵的民族志历史文献，为后学打造了进一步开拓的基础平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第一代电影人类学家，他们以学术为业付出的努力艰苦卓绝，是我们使用轻便数码音像工具的后学难以想象的。为了祛除笼罩在他们这批原创性经典上的西方中心主义“魅影”，还原作品制作过程的本来面目——兄弟民族相处之道，发掘其对电影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启发价值，笔者于2008、2009年访谈了两部纳西族影片的三位主创人员：导演杨光海、纳西族研究专家王承权和摄影师袁尧柱，并形成《你我田野》专著。本文摘录其中部分内容，先行刊发，求教于同仁。

① 该片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国内未公开发行，该片英文版 *Naxi Art and Culture in Lijiang* 由德国 IWF Institut Wissen und Medieng GmbH 发行，参见“在线电影档案 (filmarchives online) 网站 http://www.filmarchives-online.eu/viewDetailForm?FilmworkID=3d7c2e50d4451394cfa0d2ffb7d4b51f&content_tab=eng 2012年9月9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官方网站上有时长1分54秒的片段，参见：<http://www.cuaes.org/mmis-detail-BB0000-976.htm> 2012年9月9日。该片拍摄提纲、分镜头剧本和解说词，见杨光海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剧本选编》第一辑（交流资料），1981年，第813—867页。

② 该片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未公开发行。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官方网站上有时长2分钟的片段，参见：<http://www.cuaes.org/mmis-detail-BB0000-977.htm> 2012年9月9日。该片剧本、分镜头剧本和解说词，见杨光海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剧本选编》第一辑（交流资料），1981年，第739—812页。

③ 杨光海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剧本选编》（第一辑），说明页，1981年。

④ 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⑤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页。

⑥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页。

⑦（明）徐弘祖著，褚绍唐、吴应寿整理：《徐霞客游记》（上、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一、1964年初访永宁实地体验生活

鲍：我看了相关材料，《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的提纲是1964年1月写的，分镜头剧本是1965年7月，1976年11月最后成片。杨老师，您能否先介绍一下这个片子的拍摄过程。

杨：行。当时《鄂伦春族》已完成成片，拷贝都出来了，交给民族所后，我马上就着手《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这个题目了。那时候，我在北京科学电影制片厂，它和民族研究所订有长期合作的合同。正好，纳西族地方也像鄂伦春族似的，也有调查研究人员正在进行调查。

鲍：杨老师，当时是有几个可以选片子吗？

杨：当时我可以选择。但是纳西族的“阿注婚姻”，我早在拍《苦聪人》的时候就听说过。当时它被称作女儿国，我觉得很神秘、很神奇，而且，还听说有一个泸沽湖，非常美丽，所以我很早就想拍这个片子。民族研究所觉得拍这个片子很不容易表现，它牵扯到两性关系，拍得太露骨了好像也不合适，拍得一般呢又看不出来，所以他们也犹豫了一阵子。本来这个片子应该早拍的，但一直没有拍成。大家也觉得，如果再往后拖的话，婚姻形态方面可能有变化，所以还是决定尽早去拍。所以，一完成《鄂伦春族》，我就马不停蹄地直接往云南跑了。到了云南以后，历史研究所也很愿意协助我们搞这个片子。然后，我就到丽江去了。永宁属于宁蒗县，属于丽江专署管辖的。丽江到永宁，就要走路了。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的文化科负责给我安排，说找个马帮，跟着马帮一起走。正好云南省歌舞团的李士孝，他是搞作曲的，想到永宁去收集一些音乐材料，想搞一些创作。丽江县文化馆有个叫牛相奎^①，他是搞民间文艺的，专门收集民歌之类的，由牛相奎带领，我们三个人就结伴跟随马帮到宁蒗去了。当时的路是已经修通了，但是没有货源运输，也没有客流，所以路是有了，没有汽车。我们也租不起汽车，所以只好跟着马帮了。我们到了永宁，正好北京民族研究所的詹承绪在那里搞调查。他当时已经是扫尾了，原先有好几个人，有刘尧汉、严汝娴，还有云南的谁，好几个人。他们已经调查完了，材料都整理出来了。^②我跟詹承绪讲要拍这部片子，希望民族研究所能帮忙，我们是合作单位，他正好在这里，也比较熟悉。所以，请他帮我一起，把那个提纲搞出来，然后，一起来拍。我先是看材料，像拍《鄂伦春族》一样。材料有很厚的一摞，有用毛笔字写的，有用钢笔字写的。我看了好几天，足不出户看了五六天。有什么问题，问问詹承绪。觉得有兴趣的

① 牛相奎，丽江人，有多种著作公开出版，《玉龙第三国：纳西族民间故事诗》（与木丽春合作整理，1956年）、《丽江文化散论》（2011年）、《纳西婚礼与歌谣》（2009年）、《彩云下的故土》（2009年）等。

② 1963年永宁纳西族调查，参与学者有杜玉亭、严汝娴、王承权、詹承绪、刘尧汉、周裕栋、王树五等七人。1960年永宁纳西族调查，参与学者有宋恩常、朱宝田、吴湖光等三人。这两次调查付印的调查报告有三种版本：一种20世纪60、70年代由研究机构付印，简称“研究机构版”；一种20世纪80年代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种21世纪初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研究机构版一共四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调查组、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编《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纳西族社会及其母权制的调查报告》（宁蒗县纳西族调查材料之一），1963年8月；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调查组、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民族研究室编《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纳西族社会及其母权制的调查报告》（宁蒗县纳西族调查材料之三），1964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纳西族社会及其母权制的调查报告》（宁蒗县纳西族调查材料之二），197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纳西族社会及其母权制的调查报告》（宁蒗县纳西族调查材料之四），1978年3月。

材料,比较具体又能拍的这个,形象化的一些情节,我就用笔记一记,记在一个本子上。我们住在忠实乡。开基河有一座桥,过了桥以后就到区政府,我们是住在区政府里面,没住在老百姓家里。他们就派的那个区长,那里以前是永宁区,区长是纳西族,当地人,会说汉语,他也很高兴地带领我去看。雇了两匹马,他骑一匹马,我骑一匹马。给我比较老实一点的马,他走前面。先到了那个温泉乡,然后又到狮子山的这一边,八株,然后到了忠实。忠实后面又到另外那个山上,那个“司沛”^①村子。我把这几个点都看完了。金沙江边还有拉伯,那里我没去。狮子山周围的,永宁坝子的村庄我基本上都看了的。我们原先设想,纳西族影片,要合成一个片子,一个是丽江部分,一个是永宁部分。

鲍:影片原先的名字是不是就叫“纳西族”啊?

杨:那不是,也不是这么说的,原先也是想突出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丽江纳西族跟永宁纳西族,是一个民族,但是文化背景、生活习俗都有很大的差别。那怎么区别开来呢,当时是有这个问题。原先是想写在一起的,可能第一个提纲里面也是那么写的,刊在我编的那本书^②里头的。

鲍:没有合在一块儿。

杨:是不是合一块儿,我已经没印象了。后来,我们写的过程中觉得不合适,差距太大,因此就把它分开了。丽江纳西族特点最大的就是文化艺术了,包括建筑,寺庙的壁画这些;永宁呢,就是突出“阿注婚姻”了。

二、与詹承绪合作编写拍摄提纲

杨:这个剧本是在丽江写的,还不是在永宁写的。

鲍:是不是这样,杨老师,您在永宁待了几天以后,和詹承绪一块儿回丽江了?

杨:不,我先到丽江的。我先到丽江的目的,第一我要去寺院,看壁画,这些我要亲自看一看,我们叫体验生活。他呢,手头的事还没有完,也不好一起跟我来。到丽江,我就住在丽江地委那个招待所,詹承绪来了也跟我住在一起,两个房间。

鲍:杨老师,先不说丽江,我们先说说永宁。您看了材料又转了一圈以后,当时怎样想?

杨:当时我心里已经清楚了,就说,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母系氏族制度下的婚姻形式,它是封建领主制度下还保留着这个,母系制和“阿注婚姻”习俗。是这样子。必须要交代这个前提。

鲍:这个是当时的研究结论?

杨:我们一致认为是这样子的。因为当时强调的也是阶级斗争啊,当时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这根弦在我们脑子里还是绷着的。当时我们看什么事情啊,也得从阶级观点看,你是富人还是

① 据詹承绪等研究,在土司制度逐步确立的同时,永宁纳西族社会形成了司沛、责卡和俄三个等级。司沛等级汉称“官家”,是从土司家族分裂出来形成的贵族集团。责卡等级汉称“百姓”。俄等级汉称“俾子”,含有奴婢之意。见詹承绪、王承权、李近春、刘龙初:《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7—25页。

② 指杨光海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剧本选编》第一辑(交流资料),1981年。

穷人？你是侏子还是贵族？我们也得分析的。当时是这样一个印象。另外我也看到土司衙门、司沛，都看到了的。

鲍：您去永宁是 1964 年？喇嘛寺在当时怎么一种状态？

杨：嗯，1964 年。^①喇嘛寺里面还有佛像的，也有喇嘛，还有一个喇嘛在那里。喇嘛已经都还俗了，就剩下一个。那个人还是咱们统战对象，他还像是县一级的政协委员之类的，也可能是省里的人。



《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剧照 杨光海提供

鲍：您讲一下在丽江调查的情况？

杨：我白天出去，晚上回来。也是由咱们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文教科，一个姓和的科长帮助我的，跟着我去看一看，或者是他指示文化馆的人带领我去。一个寺庙、一个寺庙地看，它的五大寺庙都看过。看完就坐下来，我就把丽江部分提纲写出来了。丽江早就有过调查。另外，我主要的依据，大部分是赵银棠^②的那个《玉龙旧话》^③。

鲍：有点按“书”索骥的意思。

杨：对。它是概括起来搞的一个东西，先是介绍寺庙，然后建筑，壁画，雕刻，各种各样的手工艺品，然后就音乐舞蹈，弹口弦，唱“谷气”那些，最后介绍古乐，丽江古乐，象形文字已在前面就介绍了。那个象形文字，我都是用动画来标出来的，请的一个长老念。长老每写一个字，用纳西语念出来，然后我也就把意思标出来。比如东巴文写出“天”字，用动画表现出来，然后底下汉文翻译“天”。东巴文字形、读音和汉文翻译，都在一个画面里出现的，所以一看你就很清楚的。

① 1950 年 2 月，宁蒍和平解放，在永宁（当时县人民政府）成立“政务委员会”。1951 年 8 月，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1953 年，党和政府领导群众进行“二八”减租，1954 年又进行“三七”减租，1956 年进行和平协商土地改革，7 月建立人民政府。见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调查组、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编：《云南宁蒍彝族自治县永宁纳西族社会及其母权制的调查报告》（宁蒍县纳西族调查材料之一），1963 年 8 月，第 84 页。永宁近代史料另可参见罗桑益世活佛口述，马继典记录整理：《女儿国诞生的活佛：罗桑益世活佛回忆录》，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 年，第 1—37 页。

② 赵银棠口述生命史见和钟华：《玉龙雪山的女儿：20 世纪三代纳西族知识女性》，见李小江编：《让女人自己说话：民族叙事》，北京：三联书店，2003 年，第 281—292 页。

③ 赵银棠：《玉龙旧话》，1948。赵银棠：《玉龙旧话新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

鲍：很直接。这个方式以前没有见过啊？

杨：这在少数民族影片里还没有出现过，那是第一次。但是这是我们在科教片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方法。科教片表现眼睛看不见的，或者解剖不出来的，大部分用动画来表示，现在的动漫，它可以画，又可以扩大，把一个很小的扩大到很大。是这样子，所以我就采用了这个方法。《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也采用了动画。就是死人的那个，死了以后，捆成什么样子，然后装在一个麻布口袋里，这是一组动画。还有一组动画就是，我要讲他们母系家庭的发展，一个家庭，有“阿注婚姻”的人，也有结婚的，有娶进来的，也有嫁出去的，按照血统，是母系父系并存的家庭。

鲍：用动画表现？

杨：是的，用动画解剖一个家庭。

鲍：把这个家的每一代、每一个成员的情况，解析了一下是吧？

杨：对，把它给勾画出来以后，底下标上字，这是血统从母从父，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鲍：杨老师，这个手法也是从那个科学影片过来？

杨：嗯，就是科学片里头的一个手段，一个表现手法，也用在这个上面了。别的少数民族片用的都是地图。比如这个民族，分布在祖国的哪一部分，先画出全国地图，然后慢慢箭头标到那个民族分布的那个地方，然后点上那么几点，闪一下。然后说，这是它的居住区。

鲍：您觉得用这种动画方式比较好，是吧？

杨：嗯，比较好，大家也感觉到很满意。动画方式，一看就清楚了。后来，我觉得“表现手法”，你不管是什么片子，只要把它说清楚了，什么手段都可以应用。除非故事片，用人来扮演这个不能应用以外，其他的手段是可以应用的。

杨：写完了丽江的那个提纲以后呢，詹承绪就来了，我们就讨论了一下永宁这个片子怎么个搞法。

鲍：詹承绪一个人，还是有其他人？

杨：他一个人，其他都回去了。片子一开始讲封建领主制。那封建领主制，土司，拍它的什么？土司衙门，衙门上的壁画，狮子，这些要表现出来。然后要表现出它那个农奴，它的土地出租给人家，人家给它交税交粮，这些也表现出来。然后呢，土司下面还有司沛等级，就是贵族，它住的房子要表现出来。然后呢，俾子，就是属于这个，没有人身自由归属于土司的，等于农奴，帮助土司喂马喂猪，打柴火扛水，做这些家务劳动，这些也给它表现出来。由具体的俾子来做这个，具体地拍下来。第一段讲这个母系家庭是存在于这么一个封建领主制度下的，由于种种原因还保留着母系家庭和“阿注婚姻”。然后就开始讲一个母系家庭了。一开始就是，它的女儿去背水，打水，背上，镜头直接跟着她，跟到院子里来。是这样子拍的。然后呢，就是一个正房，“一梅”，正房，有些什么设施，干什么用的。正房主要用于做饭，接待客人。祖母住在什么地方，舅舅住在什么地方，姐妹住在什么地方。这个家庭成员的介绍，有的当喇嘛，在家里念经，有经堂什么的。

鲍：杨老师，这部分用了动画吗？

杨：没有，都没有。都是实，都是真人，真人真事拍的。

鲍：这个空间呢，不同的空间不同的人住是吧？

杨：嗯，它是四合院，楼上有接待“阿注”的房间，有佛堂经堂，“一梅”是全家的活动中心。我们不是东一点，西一点，而是通过一个家庭的活动来描写母系家庭。我们找到一个形象比较好，又

能说会道能干的一个老祖母，就是女当家人，等于是主角了，影片的主角，很多戏由她来表现出来的。然后，对外的这个，就是接待，这些事情都要由祖父承担。

鲍：他们是一家人吗？

杨：就一家人，我还住在他们家里几天呢，跟他们沟通好关系。母系家庭介绍一直到祖母交出钥匙。她的死带出了财产继承，丧葬也就表现出来了。那个婚姻习俗，也是跟着生活而来的。孩子十三岁成年礼，男孩子的仪式比较简单，就没有拍，只是解说词里说一下，重点是突出女孩子，穿裙子礼那个。成年礼后她就可以参加社交活动，可以参加跳舞唱歌，也担负一部分家庭劳动，也开始结交阿注。接下来，结交阿注的方式方法，各种各样的方式都进行了表现。阿注有长期的，有的是短期的，也有一些表现男方怎么进入到女方家里头去，打暗号，丢石头，开门这些。

鲍：这个拍摄提纲里面，我看写得丰富。他们结交阿注，有好多场合，比如说逛狮子山，狮子山什么一个活动？

杨：朝狮子山会。

鲍：对。那些真正的活动、节庆，杨老师你们碰到没有？

杨：碰到了。但碰到的人很少，因为那时候社会比较紧张了，朝会的人很少。后来，我们说我们要拍电影，叫他们尽量地多来一些。咱们区政府，就动员各个村，要来多少人多少马匹，由我们负责来给点钱，给费用。这样的话，他们来的人就特别的多，非常热闹。

鲍：刚开始时人少？

杨：嗯，适当地进行了一个动员。不是说是，原始的那个，他们来了几个，我就拍几个。当时，他们也很高兴，听说拍电影，有些是自愿来的，青年人骑着马，穿着新衣服。他们以前也没有那么热闹地过过，这下拍电影大家也很开心的。

鲍：当时是不是被禁止啊？

杨：禁止倒没有，但是很少搞，当时那是属于“封建迷信”，所以说，就是比较淡薄了，不是像我们拍电影那么热闹了。但是我们为了拍得真实一些，就适当地加以动员、宣传。

鲍：他们很高兴啊。

杨：很高兴，很热闹，说我们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回过来说写剧本，我跟詹承绪两个就按照这个层次，就是大致结构，两个人口头沟通交流都定了，定了以后我就写了。写下来，他看看，有些文字和内容，他就改一改。另外，有些内容我觉得很干巴的，我问他有没有形象的例子，有就给我举出来，我就可以把它写进去。也有这样子，向他挖材料。

三、1965年二访永宁拍摄《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

杨：回到北京后，当时还没有打字的，是刻印，由我们电影制片厂，咱们有个刻印人员，他就把这个剧本给我刻印出来，印了那么几十份，交给民族研究所。之后，“四清”就来了，我们文化部抽了一部分人参加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附近的斜峪沟村，我去了那里。呆了五六个月。我被调回来接着搞永宁纳西族的片子，那已经是到1965年了，1965年7月份我就到达永宁了。

鲍：这次拍的时候是您自己去还是有一个团队？

杨：有一个团队。这个团队人还很多，因为拍的面比较广。我们电影制片厂，我是导演，摄影师袁尧柱，摄影助理，电影学院刚刚毕业的叫滕锡绘，制片叫张文彦，我们就有那么几个人。民族研究所，有詹承绪，他是顾问，指导拍摄，日常事务都是他来管理的；还有刘龙初，民族所去了两个。到了云南，云南民族研究所又去了一个，王树五。到了永宁区，又配备了区委共青团的书记，他又是翻译，又是领导人之一，还有区长，也是我们摄制组的，还有一个就是妇女主任，当地纳西族，他们配备了三个干部。那么多人组成的拍摄组。我们对拍这个片子，大家有很多想法。如果你是要偷着拍，你比如说是，他们结交阿注，在村巷里头，或者是在田间地头，偷拍，觉得很合适，万一人家发现了，这事情造成不好的影响。如果组织拍摄，那会让人感到不太真实。所以，我们商量来，商量去，首先还是要跟他们建立感情，交朋友。多接触他们，互相沟通。他们熟悉了我们，了解了我们以后，才开始拍摄。拍摄时，尽量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比如他们劳动，我们就跟着他们去拍劳动的场面；他们过家庭生活，就进行家庭生活方面的拍摄。有一部分，就是事先，知道他们要干什么活动，我们就事先做好准备去拍摄的。就是采取采访拍摄的方法。

采访拍摄，一方面采访他们，一方面跟他们交朋友，实地记录。就是我们明确地告诉你们了，我们是来拍电影的。当时开了一个很大的会议，由政府把各个村的人都喊来，到区里开会，讲拍电影的事，就是电影组到哪里去，哪里就要支持他们，进行拍摄。当时他们误工，我们要给他们一点钱。用了他们的东西，我们也要给一些钱。所以后来，觉得这个方法很不错。



《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剧照 杨光海提供

当时碰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房子光线都很暗。真正火塘，火光也不怎么亮，天花板里面射下一点点光，四周都是漆黑的那个木板房。就觉得这个没法拍。十几个人吃饭、做饭、分饭、睡觉，都表现不了。然后，我们采取的办法就是，在村子里头，有一个闲置的房子，那个主人已经搬家了，但是房子没有拆，也是很大的，我们就利用那个房子，把这一家人的生产生活用具搬到里面去，拍完了电影再搬回来。我们把房子一边拆了，光线可以直接透进来，把天花板开大一点，这样有两边是亮光的。另外，有人物的地方，用反光板。就这样，解决了这么一个问题。样片的效果还挺不错，就像灯光拍摄的一样。

鲍：那时候没有电？

杨：没电，后来才有的。我们拍完是1966年，可能相隔了五六年了，才有电的。

四、1966年拍摄《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

杨：拍完永宁的那个片子，已经快到1966年元旦了，全体摄制组人员就到了丽江。在丽江拍到1966年的五月份，回来就“文化大革命”了。我是四月份就回来，摄制组大概就是五月份左右回来，整个两部片子一起拍完了。拍丽江部分，当时就牵扯到音乐舞蹈的问题。那时候县里头也不知道哪里有这个，我们请文化馆的人来帮助组织，也不行。后来我们就找到那个文教科嘛，那个老和，科长可能是，他告诉我们去和锡典^①，和锡典是民间艺人，他会古乐。

鲍：他不是干部是吧？

杨：他不是干部，他是农村里的一个人，也比较有名，他会看病，又会拉琴，“白沙细乐”都是他收集整理的。

鲍：他是哪个村子的？

杨：村子名字我记不得了，我去找他，我到他们村子里头去把他请出来的。我把他找到，跟他说清楚，也给他钱。然后，他就到丽江来了。他到了丽江就把各个村里会唱歌的会跳舞的，那些年轻人都组织来了，由文化馆的人统一来管理培训，因为好久都没怎么跳了。跳“阿哩哩”那些歌舞。等熟悉到一定的时候了，我们才开始拍的。这还是和锡典帮了很大的忙。

鲍：对，就是去拍这些的时候，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关键的当地人。

杨：和锡典是关键的人，他说他知道怎么搞，哪个人会弹口弦，哪个人会唱什么，因为他本人也是带头唱歌的一个。古乐队也是他组织的，他也会拉的。

鲍：我觉得拍片子，找到当地的一个关键人物也特别重要，因为你一开始去是陌生的。

杨：就是。到了丽江，我们还请录音的人去录过音。录音是后来去的，永宁也录了一些。老祖母说话啊，分配家务啊，这个说的话，语言真实。丽江的古乐，跳舞唱歌，整个一套都录下来了。所有的丽江纳西族的音乐，古乐、调子、吹口弦都有，我现在都有录音带，现在还有好几盘，盘式的，包括弹口弦。

五、1976年三访永宁补拍《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

鲍：杨老师，之前在永宁区里放过电影吗？

杨：放过，县里头有电影队。我们的样片拿到那里放过。“文革”后重新去补拍时，把原来的样片拿到那里放过。就是以前拍的，“文革”以前拍的那片子。就在广场上，大家来看。我们都把它编好了，有次序地编好了。永宁区里头放，大家来看，就是拍电影的那个地点的人。可是十年以后，有的人都死了。有的干部，被批斗得死的也有，那里已经有点不成样子了。有些干部受到的伤害很大，因为那里也搞得很厉害的，把喇嘛庙也给砸了。

鲍：杨老师，你们拍片的那个村子叫什么村？

杨：我们拍片子是在好几个村子拍的。

^① 参见牛相奎：纳西族著名歌手和锡典，见牛相奎《丽江文化散论》，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147—157页。

鲍：那个主角那个村子，就是那个老祖母？

杨：那就过了开基河，那儿有个村子。开基河那儿有座桥，过来以后，正好是一个大门，要是你们要去都路过它的门口。

鲍：他们家的名字杨老师还记得吗？

杨：都忘了。

鲍：以后有机会去寻访寻访。

杨：1976年民族研究所恢复工作了，因为以前委托制片厂拍的这个片子没有搞完，要把它搞出来。搞出来以后，把片子交给领导人审查。审查以后，他们提出来要补拍。主要是补新中国成立后新的面貌，我们原先是没有这一部分的。要加强阶级斗争，比如说土司怎么压迫剥削人，强迫俾子去劳动，那些画面要多拍一点。就是这样子，强调一下。我已经不在科影了，可这部片子是科影的，民族研究所就建议科影把我借调回来搞，因为我比较熟悉，别人搞可能不太合适。科影，跟农业电影制片厂也都是兄弟单位，大家都是互借有无，所以也比较好说话，就把我给借回来又在科影。我就又重新去了永宁，去补拍。所以我到永宁，第一次编写剧本、体验生活，第二次拍摄，第三次补拍，去了三次。

鲍：杨老师，这次补拍的合作者还是不是詹承绪？

杨：是。詹承绪，刘龙初。云南民族研究所就换了人了，不是王树五了，刘达成跟着去。时间很短，不到一个多月。这次我还带着一个科影厂专门画动画的人去体验生活，帮我搞了一个动画。

鲍：这一次拍了一些什么镜头，杨老师？

杨：这次拍了就是，兴修水利，有了学校，有了贸易公司，物资也丰富了。开基河原先是一个木桥，现在改成水泥桥了，过去没有电灯，现在已经有了发电厂了。拍了一些新的面貌。另外也拍了一点那个，加强阶级斗争方面，俾子帮着土司地里劳动的场面。

鲍：这是摆拍的？

杨：这是组织拍摄的。另外还补充了一点原先没有拍到的，就是纳西族过“斯日”，举行祭祖仪式，祭他们的祖先。这个材料是后来调查出来的，原先以为这事情已经很早了，时间太早就算了，后来感觉还是应该把它拍摄下来，因为它是很重要的，现在的人也还在这么祭，三年才举行一次。这一场面是组织拍摄的。增加了这个内容，也编在片子里头了。

鲍：拍这个片子的经过是很坎坷的。

杨：我每拍一部片子都碰到很多曲折的事情，我们干影视人类学确实不是那么简单的。

鲍：是。丽江那片子补拍没有？

杨：没有，丽江那部没有。好处就是丽江的片子1966年就录好了音了。后来补拍的时候没有补拍丽江的，而且音乐也是原来的那个，他们科影还保留着的。在片子还没有完成以前，包括音乐所有的资料都不能损坏的，需要保留的。只有等片子出了拷贝了，这些材料才被移交到别的部门去，或许销毁或许是保留。

鲍：还是算幸运的。

杨：还是算很幸运的。

[责任编辑：冯莉]